



骨子里冒出敢拼的力量、昂扬的气度

——作家何建明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何建明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茅盾文学奖院长、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院长、全国劳动模范，七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三获鲁迅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我这几年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长，写了几本书。2018年写了一本《浦东史诗》，讲的是浦东改革开放；去年写了《革命者》，今年7月已经出版。疫情期间，我滞留上海，写了《第一时间》和《上海表情》。

在了解这座城市、书写这座城市的过程中，我对上海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心得。这里，想和大家一起聊聊“上海精神的昨天和今天”。

精神基于文化，又高于文化。它是一座城市文化的精华。2003年的时候，上海动员了很多专家，对城市精神做了总结，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后来又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那么，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在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吗？从上海开埠到1949年，上海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和状态？

作为近代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一座城市，我认为上海骨子里还有一种探险的精神，或者说“码头”和“窗口”的精神。

我查了一下自己的祖先，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大概是沿着苏州河来到上海的。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城市的规模。应该说，我们的祖先来上海就是一种探险，既有点担心，又有点憧憬，想慢慢地接近它。

伴随着四面八方的人流汇聚，江南文化跟海派文化不断互动、融合，进而逐渐形成了“码头”和“窗口”的精神。人们常说，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窗口就是外来之风最先进来的地方。

上海开埠是被迫的，当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处于非常低潮的阶段。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西方文明的某些东西融入了上海，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要把历史和城市完全分割开来。一个城市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不断融合、丰富起来的，留存着一路走来的历史印记。

■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包容性、接纳性，为这一有机结合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 上海人的骨子里是坚硬的、坚强的。他们目标清晰、信念坚定，认准方向和道路后就能笃定下来了，也不会轻易改变。这样的信仰和意志，在浦东开发建设同样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 有西方人说：我们不怕中国人到处抢购奢侈品，就怕中国的晚上还到处车水马龙，人们还在忙碌地工作。这一点是了不起的。从很多在上海打拼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中国式的踏实、勤劳

■ 上海精神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风采、中国力量。在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基础上，还可以有更多的实践与延伸。这有助于让世界了解上海、了解中国

一座城市变成革命熔炉、革命中心，与这片土地上的人密不可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是让人引以为豪的一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党的一大为什么不在北京、广州召开？我有一个思考，大家看看对不对。

无论是气势恢宏的故宫，还是四四方方的大四合院，北京城多年形成的管理体制和社会生态都不利于力量弱小的革命者从事地下工作。相反，近代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堂以及交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革命者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为什么一大不在广州举行呢？按理说，当时的广州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心，也是国共合作的革命中心，基础可谓相当不错。但仔细想想，广州那个地方最强大的革命力量是资产阶

级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显然不好在另一个政党的心脏地方搞革命。

不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还是与这座城市的精神有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三教九流在这里汇聚。因为三教九流，所以海纳百川，包括很多先进知识分子也被大量吸引过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来到上海，陈独秀、鲁迅也来到上海。因此，那个时候要酝酿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上海是最合适的。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还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此前，我们研究党史和革命史，常常

讲“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秋收起义的湘赣边界、井冈山讲到延安、西柏坡和北京。

其实，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革命实践恰恰是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开启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对城市武装斗争的实践，也就不可能有后来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正是由于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城市武装斗争，才为后来找寻到正确的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

我们现在讲，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包容性、接纳性，为这一有机结合提供了机

会和可能。

写作《革命者》的过程，也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革命斗争有了再认识。城市斗争的残酷有时候更甚于农村，枪炮来了没有地方躲、没有地方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段更是极其残忍。上海人不是软绵绵的，上海人的骨子里是坚硬的、坚强的。他们目标清晰、信念坚定，认准方向和道路后就能笃定下来了，也不会轻易改变。

这样的信仰和意志，在浦东开发建设中同样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我在《浦东史诗》里有相关的论述。

总之，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革命熔炉、革命中心，与这片土地上的人密不可分。

从决策者到建设者，都愿意将自己的汗水、心血奉献给这片土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土地改造完成后，怎么进行工业、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改造？中国共产党选择将这场改造的中心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工业城市。

在中国从农业国家到工业国家的转变中，上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为改革开放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启示。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让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如何管理城市。后来，很多大资本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成为社会主义的贡献者和建设者，也充分展现了上

海精神的价值。

提起改革开放，我们都会想到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深圳的城市建设。其实，改革开放后，上海是内地第一个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开展土地批租的城市，第一座与外资合作建成的高楼就在黄浦区。上海现在最高的建筑是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第二高的是环球金融中心，第三高的是金茂大厦，每一栋大楼都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

当年，上海要开发浦东，但建设压力很大，尤其缺乏建设资金，怎么办？于是，上海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早上，先由财政部门开出一张“空

头支票”，浦东开发公司再拿着这张“支票”到土地部门开发土地的评估费用。拿到土地部门评估作出的文件后，就转到土地交易市场挂牌，以换取开发土地预支支票。这时，开发公司所获得的支票金额已经远高于财政部门开出的金额。

当天下班前，开发公司又以火箭般的速度，填上跟早上同样金额的支票，及时送回财政部门……如此空转一天，财政部门从账面上看一分不少，而浦东在账面上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笔钱。这被称为“财政资金空转，土地批租实转”。

土地交易完办以后，浦东新区管委会方面就跟中国香港的老板说：你看我现在有钱了，这一块地现在归我了，土地证也有了。老板们一看所有材料都具备，就交了几亿元的“预付金”。这样一下子，浦东开发就有了更大的底气。

这样一个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说起来还是很复杂、很惊心动魄的，由此可见当时改革之艰难。但从领导者、决策者到建设者和普通市民，大家都愿意将自己的汗水、心血奉献给这片土地。这是蕴藏在上海这座城市深处的一股精气神。

“上海”是一个动词，永远朝着梦想进发，始终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上海精神的昨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年代凝聚、铸造的革命初心，上海精神的今天则有力地推动着新时代奋进开拓的新征程，催生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实践与经验，成就了锐意进取的自贸试验区创新史诗。

从个人理解的角度来看，上海精神的特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和解读：高贵。

其一，我们的城市建设吸收了纽约、巴黎、伦敦等世界一流城市的优点，并且还在继续前进。

其二，中国人民是特别聪明、勤劳的人民。有西方人说：我们不怕中国人到处抢购奢侈品，就怕中国的晚上还到处车水马龙，人们还在忙碌地工作。这一点是了不起的。从很多在上海打拼的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中国式的踏实、勤劳。

其三，上海现在建设得这么好，还在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远的理想以及对人民城市

负责的使命感。这是解读上海精神时必须抓住的一个根本。

我们从来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是不断地向高峰迈进。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宗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安康。这是上海城市的宝贵特质、高贵品质。

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在《浦东史诗》中对上海作了一个创解：当年我们的祖先认识这片土地的时候，“上海”就是一个动词。上海精神是骨子里冒出来的一种敢拼的力量、一种昂扬的气度，我们不断向未来前进，我们不断向往的方向看齐，我们永远朝着梦想的目标进发，我们始终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形势下，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征程中，我们要认真思考怎样把城市建设得更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如何更好地融入其中？

由此，“高贵”又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是人自身修养的理想境界，是能力达到一定高度的境界，是财富达到一定高度的境界，也是我们精神臻于完美的境界。

具体来看，高贵包含的第一种品质，是对不同文化和事物的包容和大度；第二种品质，是城市和居民的文明程度；第三种品质，是自上而下的自觉意识。

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上海有序开展各项防控工作，较好地应对了各种突发事件，体现了正确的判断力、实践力和执行力。

比如，疫情暴发初期，上海迅速作出决定，将位于金山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作为集中隔离定点医院。

又如，作为重要的国际航空港，如何内防反弹、外防输入？上海进行了科学布局、精准防控，向虹桥机场、浦东机场派出一批又一批志

愿者，前前后后几十万人守护着国门。同时，多部门协同配合，全力保障从机场口岸到隔离酒店、救治医院防控的衔接，强化全程闭环管理。

再如，在城乡各个社区，广大社区工作者、居村干部、志愿者、下沉干部以及全体上海市民筑起了一道道严丝合缝、比肩联袂的钢铁长城，捍卫了家园的安全。

这样的有序、有为，与上海致力于以绣花般的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促进城市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运行更顺畅、更高效、更可持续有着直接的关联。

总之，上海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缩影，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风采、中国力量。在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实践与延伸。这有利于上海城市的发展，也有助于让世界了解上海、了解中国。（整理人：周丹旎）

优秀党员、市级劳模为您服务

★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三级资质 专做中小户型设计与施工 给新上海人一个温馨的家

云安 装潢 不花一分钱 设计方案、详细报价带回家

服务热线 **400-021-2956** 特别推出新居装修
60m² 80m² 105m²
一房一厅 两房两厅 三房两厅
5.2万元 6.4万元 8.8万元
详情请点击 www.shyunan.com.cn

※ 总部：浦东新区东方路1381号蓝村大厦22楼 A-B座 电话：50897001 50898079

宝山/静安	徐汇/闵行	普陀/嘉定	浦东/金桥	杨浦/虹口/黄浦
共和新路5008弄32号5楼	古美路35号303室	曹安公路1558号412室	长岛路1201弄25号	大连路791号
E座(近好美建材超市)	(近莲花路)	(轻纺市场隔壁)	(近台儿庄路)	(周家嘴路口)
56033286	34228046	69186409	68953429	65356973

消费 市场 专版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

编者按：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国民党统治集团则试图继续维持其专制体制。战后的国际格局及美苏的对华政策，也要求中国各党派采取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

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和平呼声，电邀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经过谈判，国共双方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随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转赴南京，继续同国民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在为期10个月的谈判中，中共代表团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实现国内和平做出了真诚的不懈努力。同国民政府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肩负的重要使命。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分裂的内战政策，导致谈判最终破裂。在此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国统区广泛地领导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争取朋友，教育人民，对开辟第二条战线，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乘马歇尔专机到南京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就着手准备还都南京，并责令先期回到首都的南京市政府，在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将国府大院建筑群按期进行彻底修葺，确保



赢得人心的较量

周恩来与国共南京谈判

吴小宝 著

政府顺利回归。

1946年，为了还都之事，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官员先期到达南京。4月30日，国民政府下达了“还都令”。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

早在1945年底，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重庆局就根据国民政府将返都南京，谈判中心也将转到南京的情况，曾多次研究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及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和代表团工作机构问题，并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要解决房子问题。

1946年4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分别在上海、南京拨发敌伪房屋，做两地中共办事处。

4月4日，周恩来又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请他关照此事。后又派出龙飞虎、邱南章等人先行前往南京、上海，筹措、落实代表团两地的办公用房。在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反复交涉中，国民党当局对此事多次为难，一拖再拖，直到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的几天前，才将南京梅园新村30号和17号两处房子拨给中共代表团，作为其南京办事

处。代表团又在南京买下中山路360号，作为南京《新华日报》办事处用房，开设门市部，经销《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各种进步报刊、图书。由国民参政会临时借给两辆军用小吉普车做交通工具。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后因梅园新村的住房不够，又以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私人名义，购置了梅园新村35号的房子。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的同时，在上海租下了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设立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

4月28日，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话别茶会，应邀前来出席的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两三百人之多。周恩来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东北的战况，又谈到与国民党谈判的艰难，然后他无限感慨地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近五十之年（岁）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4月底，中共代表团迁移南京的准备

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实际上，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共中央就曾在南京设立过办事处。1937年8月，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了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为了加强国共两党的联系，经协商同意，中共中央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国民政府首都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设在南京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战斗序列，将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因此，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傅博是党中央代表，叶剑英、李克农等都是党中央派出人员，所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同时也是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11月12日上海沦陷，19日苏州失守，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至汉口、长沙、重庆等处办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叶剑英、李克农等办事处人员于12月初撤离南京。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代表邓颖超、秘书长齐燕铭以及中共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廖承志、钱瑛、王炳南、童陆生、章汉夫、宋平、章文晋和电台机要人员共10余人，乘马歇尔专机到南京。中共代表团代表陆定一亦于当天乘民航飞机到达。董小鹏和部分电台机要人员带上从美军借来的400瓦电台于15日乘美军运输机到南京。董必武、李维汉等30余人，因飞机发生故障，16日才到。

（一）

连载